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

• 孫隆基

千年之交是對中國近千年作一個「長時期」綜觀之適當時機。宏觀地說：西元兩千年之初中國是世界領先，至千年之末中國已淪為「落後國家」。這個千年又可分為兩半，前五百年中國領先，後五百年中國逐漸落於西方之後。為避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窠臼，本文亦注目中國與內亞洲、西亞、南亞的發展相呼應的地方。

一 宋朝：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西元一千年，正值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提出宋代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說法，有內藤湖南等和近來美國的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後者之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發展出全面的市場經濟為歸依^①。中國歷史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面市場經濟這個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

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自隋朝重建科舉制度以來，世襲門閥的政治壟斷被打破，至唐末，中古式的貴族政治整個沒落。宋代上承此勢，由科舉制度出身的文官政治變成主流。此外，宋朝採取重文輕武的措施，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先由文官統治的國家。在財產關係上，宋代由門閥私有制和國家分配土地制轉變為土地自由買賣和契約化。國家也基本上放棄用國有土地調節土地兼併、貧富不均的施政。宋代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併」^②。由於均田制的崩壞，唐朝於西元780年實行「兩稅制」，是對兩項現實——私有制和貨幣經濟——的讓步。宋代上承唐代兩稅制，從此國家基本上認可私有財產，並着眼於政府的現款運轉。它「從由來已久的國家必須負責糾正土地分配不均的教義全面撤退」^③。

宋代「不抑兼併」，並不造成魏晉

提出宋代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說法，有內藤湖南等和近來美國的麥克尼爾。後者之前提仍然是以它未能發展出全面的市場經濟為歸依。中國歷史形態是否含有達到全面市場經濟這個目的，值得商榷。然而，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

宋代市鎮趨於工商業化，因此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十倍以上，但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後來為政府接辦。

南北朝式的世族莊園所有制，因為科舉制度已大致上決定社會地位的升降。在宋代，中古式的身份制雖仍殘存，但政府基於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民分為「主戶」與「客戶」，即只看財產，不看身份。擁有財產的主戶直接承擔各種賦稅，無產業的客戶則不直接承擔。佃農是鄉間的「客戶」，不再是從前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在城市裏，主戶身份並不以房地產之有無為唯一標準，也包括有無店鋪、庫房，以及從事經營的資本，客戶則是僱員或房客。這種分類法是根據財產關係，也把契約關係普遍化④。

唐代城市多為行政中心，宋代市鎮趨於工商業化。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宋代則放任自由，因此商業區與住宅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成很大規模，例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當時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人口在30-50萬之間的巴格達。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貨幣經濟的發展。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十倍以上，但仍不敷應用，在缺銅的情形下，宋真宗年間出現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後來為政府接辦。中國發展至宋代，商稅也日形重要，它成為城鎮徵收的主要專案。從遠洋貿易抽取的稅收，也達史無前例的比重。

學者們曾討論宋代為甚麼沒有出現「工業革命」。在北宋，中國人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企業僱傭數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以1078年一年為例，華北的鋼鐵業達年產125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

產7.6萬噸⑤。此外，礦冶、造紙業、製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宋代中國是前現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紙、印刷、火藥、羅盤雖然多發明於前代，但至宋代成為大規模製造業。

宋代中國的「近代性」也表現為中古佛教的衰微和世俗精神之來臨。後者表現在原始的山水畫和儒家理學之抬頭。無法重組漢唐「天下」的宋代，必須和遼、西夏、金、蒙古等敵國並存，反倒更近似近代「邦國」，抵抗外族入侵成為國民生活的常態，一種初期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而宋代的抗敵英雄在中華民國誕生時期被編入「民族英雄」譜系。宋代已經有印刷術這種傳媒，按照當代某派國家學說，印刷術是形成近代國家這個「想像的團體」的主要因素⑥。

二 西元一千年前後的 世界大事

唐宋之交，是今日西歐和俄羅斯文明的嬰兒期。在這裏，必須交代一些歷史背景，比較中國與西方歷史的共同性與分歧性。

在古代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崩潰後，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後來隋唐帝國憑大運河整合南北，在此基礎上重建「第二帝國」。至800年，中國已經過了中唐盛世，法蘭克人在西部始與羅馬教廷合作，嘗試重建「西羅馬帝國」。這個嘗試，促成了西歐文明的誕生。俄羅斯則在988年才脫離原始宗教，從拜占廷（東羅馬）處接受希臘正教，進入文明階段。而1056年拉丁教會與希臘正教正式分裂，西歐與俄羅

斯分途發展形成定局。因此，西歐和俄羅斯的童年，都在唐宋之交。

在中國建立「第二帝國」的時候，西亞也為回教「大食帝國」統一。回教創始人謨罕穆德與唐太宗同時，而大唐與大食在古代社會式微後，各自在它們繼承的地域裏締造一個「中古」的綜合。大唐進入九世紀，中央政府衰微，地方上節度使割據，皇帝的廢立則掌握在宦官手上，政治腐敗終於引發農民起義，處於重重矛盾的唐室在907年滅亡。大食帝國進入九世紀，地方割據勢力興起，宗教派系衝突加劇，君主哈里發 (Caliph) 仰賴由突厥人組成的奴隸軍保護，結果廢立權落入他們手中。政治腐敗與賦稅沉重引起農民、游牧部落和奴隸起義。至945年，巴格達的哈里發只剩下名義，最後一位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軍殺害。1279年蒙古滅南宋。

在這段期間，中國與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兩個頂峰，文教和科技發達。回教從阿拉伯征服到大食帝國，走向波斯化，繼承了西亞地區的文化遺產。由於它處於舊大陸的中間地位，大食匯聚了希臘羅馬、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知識。後來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臘羅馬的遺產，多經由回教文明之手。

西元一千至兩千年之交也是印度的轉捩點。西元七世紀，佛教的「第三波」已經在醞釀，那就是「密教」。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進佛教，傳入的就是第三波的密教。在印度，演變為密教的佛教與印度教漸不可分，走向沒落，而印度教內虔誠派 (bhakti) 興起，變成大眾運動，至一千年之末已佔優勢。西元997年，大食帝國衰落後，第一個由突厥人建立的獨立回教

國家喀茲尼 (Ghazni) 從阿富汗侵入北印度，對印度教大加殺戮。但在十二世紀初，一個繼起的突厥回教政權入侵北印度，對佛教實行同樣的摧殘後，佛教從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 (Sultanate of Delhi)，乃今日南亞分成印回兩大派之始，取代第一個千年的印佛兩大派對立的局面。

中亞地區的突厥化與回教化也在兩個千年之交。西域地區的人種自古以來以「吐火魯」(Tokharian) 為主，至唐代，其文化則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中亞地區最早皈依回教的是在新疆西部和喀什額爾地區的「黑汗」(Karakhanid) 帝國，在西元十世紀中期。在十世紀末，鄰居的塞爾柱 (Seljuk) 族也改奉回教^⑦。這些都是突厥民族，今天這整個地區即稱作「土耳其斯坦」。

三 西元二千年前期的 「新型邊疆民族」

宋代有當代世界最驚人的戰爭機器：125萬人的常備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官營的大規模軍工生產業，利用大運河輸送的後勤系統無比優越，其國防費用之龐大程度會使漢唐大帝國破產，但北宋對遼與西夏在軍事上始終吃癩，於1127年亡於女真人的金朝，至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消滅，真是令人費解^⑧。必須強調：宋代的武裝還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將火藥應用在戰爭上者。

當文明處於鼎盛狀態，對野蠻民族總是無例外地佔上風。然而，宋朝在各方面發展水平都超越漢唐的情形

在中國建立隋唐「第二帝國」的時候，西亞也為回教「大食帝國」統一。在這段期間，中國與回教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兩個頂峰，文教和科技發達。由於處於舊大陸的中間地位，大食匯聚了希臘羅馬、中國和印度的科技知識。後來西方吸收的科技，包括古代希臘羅馬的遺產，多經由回教文明之手。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為新型邊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國衰落後稱雄於西亞的突厥人。他們在大食帝國內部用武力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主人。這種滲透方式與遼、金、夏等國的「邊疆化」不同，它造成回教世界定居與游牧之分界崩潰。近代以前的世界之匯通，是野蠻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資源創造的業績。

下，卻從開頭就受制於較落後民族。首先，二千年初期的游牧民族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是蜕化為「邊疆國家」。它們的特徵是「非部落化」，在軍事上保留歐亞大草原騎馬民族的驍悍，但其轄地卻囊括文明地區的定居民和市鎮，因此在政教上又得採用文明制度，遂兼有兩者之長。

秦漢和隋唐帝國面對的匈奴和突厥是分為部落的，易被分化和各個擊破。新型「邊疆國家」既和老式游牧帝國不同，亦有異於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後者是佔據了中原，但全盤漢化。新型邊疆國家的前奏有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和回紇等例子，他們接受中國文化而進入文明階段，但卻保留自身的民族認同，特別是語言，而且另創本國文字。

因「非部落化」而蜕化為新型邊疆民族最成功者，莫如大食帝國衰落後稱雄於西亞的突厥人。他們有被俘虜而在市場上拍賣者，也有自動歸降的，不少成為奴隸士兵，因此「非部落化」極徹底^⑩。後來，他們在大食帝國內部用武力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主人。這種滲透方式與遼、金、夏等國的「邊疆化」不同，它造成回教世界定居與游牧之分界崩潰——這個疆界模糊化的特色至今猶存。

1040年，剛改奉回教的塞爾柱突厥人從河中(Transoxiana)南下，於1055年又佔領巴格達，其領袖自號「蘇丹」，仍奉哈里發為傀儡。塞爾柱的兵威繼而掃向小亞細亞，意圖消滅拜占廷的東羅馬帝國，亦即是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發動「聖戰」，是引起西歐十字軍東征的導火線。

此時，回教世界的舊領導階層——地主和官僚——已失勢，統治階層走

向軍事化。這種形勢造成回教世界從十世紀到十六世紀的一個模式：突厥軍事集團吸收回教的都市文明，和阿拉伯、伊朗和印度的城市住民尤其是大商人勾結，共同剝削廣大農村裏的勞動者^⑪。這與中國的文官統治在城與鄉、商與農之間保持一個平衡的試圖比較，無疑是落後的制度。

但近代以前的世界之匯通，卻無關在家裏在一個舉世無雙的龐大人口間力圖保持「太平」、憧憬「大同」的中國文官統治所促成的。它反而是野蠻的武力利用文明的資源創造的業績。這句話最適用於突厥人的後繼者蒙古人身上。

西元十一到十三世紀的東亞是當時世界的「高科技戰場」。宋、遼、西夏、金和蒙古間的連年戰爭，使火藥武器從燃燒彈階段進展至爆炸彈藥階段，最後發展出槍筒與子彈的前身^⑫。蒙古以該戰場最後的贏家身份，幾乎征服了全世界。

四 蒙古大帝國：全球史第一個「世界系統」

在新千年前夕，《華盛頓郵報》選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倫布，不是牛頓，而是野蠻人成吉思汗。他雖然殺人如麻，但「他和他的子孫締造了一個廣大的自由貿易區，橫跨歐亞大陸，大大地促進了東西文明的連接」^⑬。這是現時代的「全球化」眼光。

在成吉思汗草創時代，落後的蒙古人還不屬於包含文明領域的新型邊疆國家。但成吉思汗統一大漠時，已用人工方式把部落融合為「國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模仿契丹人用十

進位方法建立起一個指揮系統，因此到後來所謂「蒙古」已非幾個蒙古人部落的聯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統一起來的國家。但蒙古人的落後性仍使他們早期行動之破壞性壓倒任何建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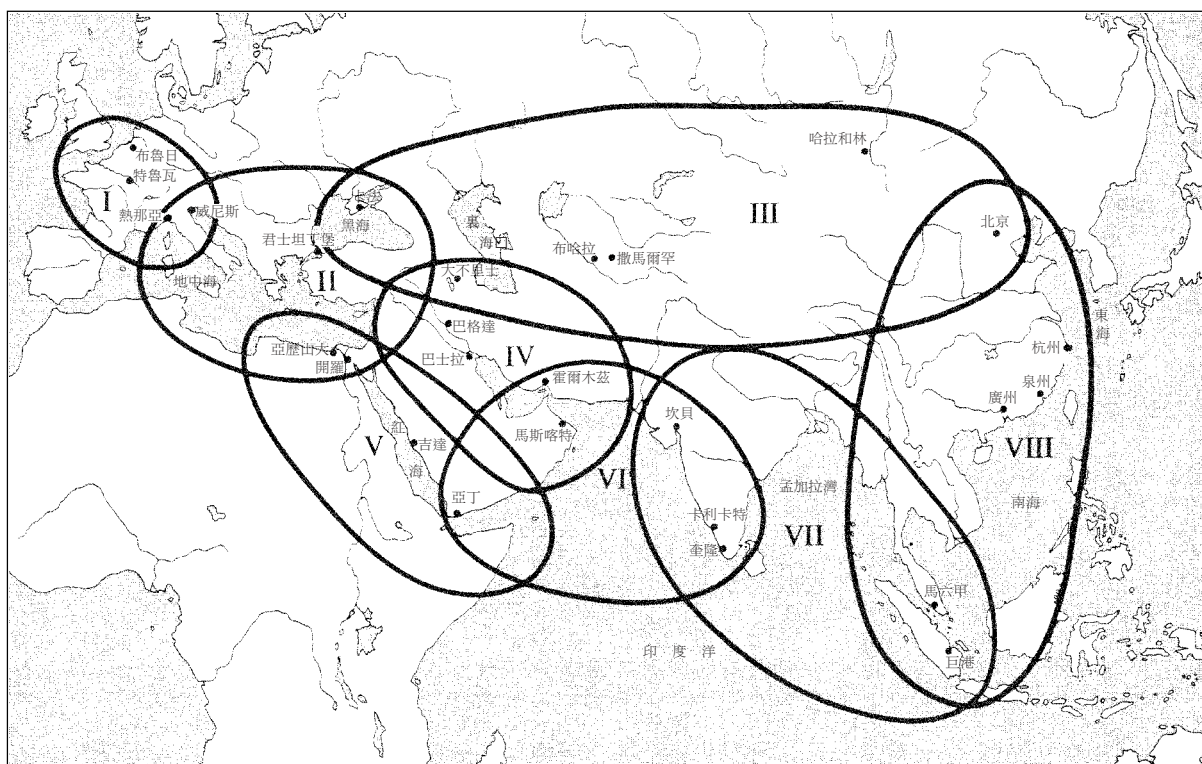
1219-21年成吉思汗消滅花拉子模期間，對河中地區、阿富汗與呼羅珊進行大破壞，把這個定居與游牧分界已經不穩定的地區進一步推向「大漠化」。窩闊台汗於1234年消滅華北的金朝，仍打算把該地區的農耕文明鏟除，將它變成大牧場，後被契丹貴族耶律楚材勸止。從此，蒙古人變成與南宋對立的中原「北朝」，最終成為繼統的「元朝」。

在新大陸還沒發現，海洋還未成為連貫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時代，歐亞大草原是唯一貫串舊大陸的通道。總的來說，蒙古帝國為整個歐亞大陸創造了一個世紀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保持陸上國際貿易幹線

「絲綢之路」暢通無阻，也使從西歐經中東經印度洋經東南亞到東亞的海上貿易空前蓬勃。

近來，有人對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作出「後殖民主義」批判，認為西方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非全球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十三世紀時，一個世界系統已經成形，它並不像今天一般是西方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十三世紀的世界系統可分為八大圈，從泰西到遠東計有：(1) 西歐圈，它與(2) 地中海圈有交疊點，後者與(3) 歐亞大草原圈、(4) 埃及紅海圈、(5) 中東波斯灣圈交疊，(3) (4) 之間亦有交疊，而(4) (5) 則與(6) 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疊，後者又和(7) 東印度洋東南亞圈交疊，後者則與(8) 中國南洋圈交疊，最後這圈又和(3) 的極東部分交疊^③。這個世界系統至十四世紀初達巔峰狀態，但亦於該世紀中後期趨於瓦解，與「蒙古和平」相始終。

十三世紀時，一個世界系統已經成形，大致可分為八大圈(圖)：(1) 西歐圈，(2) 地中海圈，(3) 歐亞大草原圈，(4) 埃及紅海圈，(5) 中東波斯灣圈，(6) 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7) 東印度洋東南亞圈，(8) 中國南洋圈。這個世界系統至十四世紀初達巔峰狀態，於該世紀中後期瓦解，與「蒙古和平」相始終。



西元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邊疆民族是天之驕子，到後五百年，則由航海國家獨領風騷。在前階段，歐亞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但火藥武器的發展卻宣判了草原帝國的死刑。世界史進入「近代」，海洋繼大草原成為世界的新凝固劑。

「蒙古和平」保障了歐亞大陸的匯通，在這個多中心的世界系統裏，其精華地段無疑是中國，它成為大汗自身的領地。在中國悠長的皇朝史裏，元朝把宋代無法重建的「天下」以外族入主身份加以恢復，似乎可當做中華帝國第三次重建。但元朝並非一個純中國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還是蒙古世界帝國的名義共主。蒙古把中國納入「全球化」，與印度洋和西亞的聯繫加深，並與西歐首度接觸。

五 蒙古世界統治的遺產

對中國整體來說，蒙古的遺產有下列數項。蒙古滅金時造成華北殘破，一度是北宋重工業區的豫東和冀南從此一蹶不振。蒙古雖與南宋長期在國界上交戰，但滅宋過程卻很短，因此江南比較完整。北衰南盛的形勢從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滅了大理國，使雲南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也於元時內附。從元代開始，「回民」成為中華五大族之一，他們多是隨蒙古人入主中國的「色目人」之後代，在元代又稱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蘭。

對世界總體來說，蒙古人有利於歐洲的興起和亞洲的落伍。蒙古旋風對西亞回教世界的摧毀特別沉重。他們對前大食帝國的核心地帶破壞未盡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紀之交，為孛子帖穆兒 (Timur Lenk) 完成。他是脫胎於察合台汗國的突厥人，雖然屬於文野分界的定居民這一方，非但沒有保衛文明，反而刀刃向內，並模仿野蠻階段的蒙古人之大破壞行動。從此，定居與游牧的界線早已不穩定的

伊朗——尤其是東部——基本上變成大漠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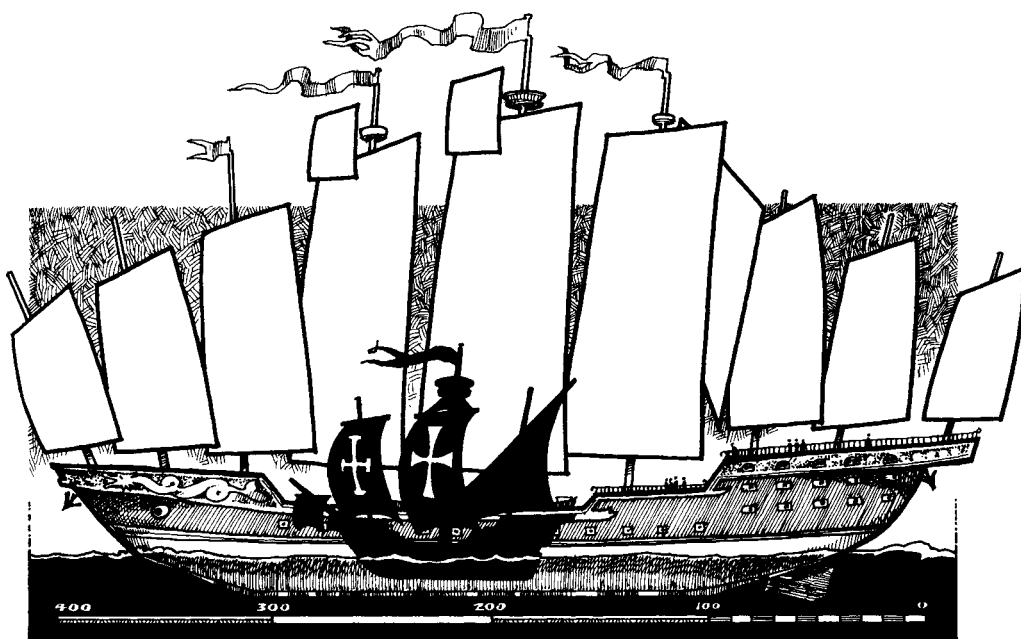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敵。蒙古在西亞地區造成的後遺症，無疑是幫了西歐的一個大忙。西歐人在「蒙古和平」期間首次與中國直接接觸，親眼目睹中國的富庶。此後，西方的經濟發展總有一股東向的欲望。哥倫布就是看了馬可波羅的遊記，想從大西洋另闢新航路到達中國，而無意中發現新大陸。

蒙古軍西征也把中國的「高科技」西傳。尤其是火藥武器來到歐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紀的法國和義大利是繼東亞之後的第二個「高科技戰場」。從此，歐洲在這方面領先。至十六世紀初，西歐人將最新型的火炮裝在戰艦上，配合中國發明的羅盤，開始征服海洋^④。

六 青黃不接的十五世紀：中國的海上霸權

西元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邊疆民族是天之驕子，到後五百年，則由航海國家獨領風騷。在前階段，歐亞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鐵騎加上文明國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藥武器的進一步發展卻宣判了草原帝國的死刑。世界史進入我們的「近代」，海洋繼大草原成為世界的新凝固劑。

當全球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散套以後，離西方海上霸權的興起還有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內，中國完全齊備稱霸海洋的條件。明初有前人積下來的基礎。首先是宋室南渡，賴江防抵禦胡騎，在中國史上首次建立獨立



當全球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散套以後，中國完全齊備稱霸海洋的條件。鄭和於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領62艘船，最大的「寶船」比87年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三條小船大將近五倍，而且設備亦較為先進(圖)。中國在宋代已經發明水密隔艙，歐洲船舶到十八世紀才有這種設備。

的海軍衙門。除了國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稅收上越來越依靠遠洋貿易，在高宗時代曾佔政府收入現錢部分的20%^⑮。

從宋代開始，外貿已經擺脫「朝貢」體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襲此勢，它的政權性質又是「全球化」的。這個傾向到了明朝開始逆轉。蒙古是世界帝國，其崩潰後必然出現地區性的「民族主義」逆反。它包括莫斯科的俄羅斯以及什葉派伊朗——該兩地今天的民族認同都是「後蒙古」產品。明帝國重建的也是較狹義的、只包括漢族的「天下」^⑯。明太祖只把蒙古人逐至塞外，結果他們又重組遊牧帝國，威脅時刻存在，北疆重新成為第一國防線。明中期以後，屢遭倭寇、滿州侵略，於是逐漸出現宋代那種漢人「民族」意識。

明太祖在沿海一帶也頒布海禁令。朱元璋打天下時的勁敵張士誠、方國珍等的地盤就是具海洋帝國雛形的南宋舊地。這些勢力的殘餘拒絕接受明統，逃亡海外。但海禁令禁止民

間出海，卻沒有終止晚唐以來的遠洋貿易，它如今成為中央的專利。國際通商被加上「朝貢」的緊身衣。

這個國家對外貿的壟斷，使明初的海軍一度膨脹。它的前身是元朝的海軍。元朝合併了金、宋、朝鮮的艦隊，成為世界第一海軍大國，曾兩次東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艦隊在數量和船隻體積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軍在十五世紀初的鼎盛時代有3,500條船隻。鄭和於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領62艘船，最大的「寶船」比87年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三條小船大將近五倍，而且設備亦較為先進。中國在宋代已經發明水密隔艙，歐洲船舶到十八世紀才有這種設備^⑰。最令人矚目的是對2.8萬人的遠洋艦隊的補給，這個問題必須擁有海外殖民地或海軍基地才能解決。明朝沒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國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鄭和最後一次出海(1431-33年)在宣宗朝。自此，中國從海洋退縮，而如此壯舉最後連一點漣漪都不剩下。

最有資格重組新世界系統的中國，卻在關鍵時刻撒手不管。原因何在？答案或許在明朝外貿與「朝貢」不分，更深層的原因是鎖國心態抬頭。明代中國擺脫蒙古，有如二十世紀共產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序斷裂一般，都不可避免地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

在鄭和時代，回教勢力——尤其從印度南端擴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張。鄭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勢力達到該區，亦是順其原勢，並無橫加干涉。中國人撤離印度洋後，它很快成為回教的內海，西至西非海岸，東至大明在南洋的據點麻六甲，都漸次皈依回教。這是透過商旅和傳教士的活動，非經由武裝征服。因此，當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末侵入印度洋，該區毫無抵擋能力。

問題在於：當蒙古的「世界系統」散套，而西方海權還未興起之際，最有資格帶頭重組新世界系統的該是中國，但它卻在關鍵時刻撒手不管。原因何在？

答案或許在明朝外貿與「朝貢」不分這點上。鄭和的下西洋並非孤立現象。成祖一朝，對不包括安南在內的南洋國家就出使了62次，多半是只前往一個國家，規模沒有鄭和那麼龐大。但它們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負責朝貢國使團的接送。明朝既然當了宗主國，有藩屬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軍保送他回去復位。這個負擔的確沉重。成祖死後，北京連前往黑龍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團亦裁掉，「下西洋」自然是被優先開刀的專案。但遺憾的是明廷連遠洋艦隊也裁掉。

1426年，明海軍在東京灣吃敗仗，使明廷放棄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懷疑海軍是否有用。此時大運河也已經修復，並且裝上新發明的閘鎖，內陸的運河漕運比沿海運糧安全得多，於是，海軍被大量裁減^⑨。1449年發生土木之役，蒙古勢力復熾。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內亞洲國防線，不久就開始建築長城，從西到東，達一世紀才完成。當時的海疆

並無威脅，明廷不會同時維持兩大筆國防經費。

但明朝顯然放棄南宋用外貿養海軍的措施，非但不准國人出海，海洋國來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而且完全為政治服務。令人費解的是，明廷接二連三地下令把造船的體積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⑩。如果政府裁減海軍只是政策性的問題，無須變成法令。它們顯然是針對私營企業，國家自己解散海軍，但又防止民間的力量超出官方。種種限制導致鄭和時代製造九桅大船的技术至明末失傳。

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的鎖國心態抬頭。明代中國擺脫蒙古，有如二十世紀共產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序斷裂一般，都不可避免地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雖然沒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權，但用羅織的方式消滅富戶，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誅戮殆盡。「幾場大清算下來，可以肯定的是全國充斥了小型的自耕農。」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是烏托邦式的，「它更像一個龐大的農村公社而不像一個國家」^⑪。他無向外擴張的野心，生前為子孫列下一份「不征國」的名單，其中包括朝鮮、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諸國。

成祖這個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實更像是最後的一個蒙古「汗」^⑫。他五次到塞外親征蒙古，不像華夏君主所為。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勞民傷財而終告失敗，成祖又把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貢體制，擺蒙古「大汗」的派頭，強制外國君主親自到北京朝覲中國大皇帝，他們不肯來，就派海軍去攻打。成祖的體系則是成立對客戶友善的接送服務。但兩者耗資同樣巨大。成祖以後，儒家文官政

治的「不勞民傷財」的「祖訓」就變得更無可非議。

七 印度洋：從中國的「朝貢體制」到西洋人的「公司體制」

西歐人對遠東和印度洋的財富有一種饑渴。為了另闢到東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個世紀，終於在1487年繞過好望角，進入了印度洋。隨之而來的就是武裝恐怖行動。西歐人帶來地中海作戰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諸邦根本無招架之力。1511年，葡萄牙人滅掉中國的藩屬麻六甲，把它變成殖民地。

早於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哥倫布已經發現新大陸。從此，大西洋變成西歐人的內海。在這個大西洋圈，西歐提供資本和經理人才，從非洲把黑人運到美洲當勞動力，去開發美洲的資源。一個三洲分工的西方中心的世界體系開始冒現。西洋人又從美洲和印度洋進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誕生，並對歐亞大陸造成合圍之勢。

當時的明廷在幹甚麼？明世宗一朝(1522-67年)大半在鬧「倭寇」之患。他們幾十年延續不斷地犯境，船隊和人數規模都很大，不像是當時的日本所能發動。「倭寇」裏有日本人，但頭目都是中國人^②。他們是宋代以來已成氣候的沿海豪強，在海外早建立關係，如今被明廷禁令變成「法外」的海盜。在對「倭」作戰時，曾一度傲視世界的明帝國海軍沒有蹤影，甚至連有效的海岸巡邏也不見。待海盜登陸深入內地，佔領縣城和衛所後，才由陸軍將領戚繼光等人去圍剿。

由於海禁越禁，亂子鬧得越大，明穆宗(1567-72年)朝只好讓步，局部解禁，在國家壟斷之外允許有限度的「私營化」，限在漳州一個口岸。明神宗則於1589年把民間能出海的船隻限定為每年88艘。這不止太少，也太晚。至此時，明帝國的海洋朝貢體系已經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體系裏，「中國貿易」變成澳門—果阿—里斯本路線和澳門—長崎路線的一個環節。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馬尼拉環節，和他們的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環節在菲律賓接駁。

從葡萄牙人開始，西歐人把印度洋的貿易直接接駁上歐洲的市場，把它變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統的一個環節。葡萄牙人還成立在海上收「買路錢」的制度，但他們沒有帶來革命性的變革。葡萄牙國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資海洋貿易，和他們一樣都沒有現代公司的觀念，其作風也一概是國庫與私庫不分，國家收入與商業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見得投資於其他具生產性項目^③。西葡等舊教國家也常讓傳教的狂熱干預其貿易行為。

因此，我們不看誰先佔據印度洋這個當時世界經濟的樞紐——蓋盤踞舊大陸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為內海——而是看誰為這個樞軸地段帶來革命性的新組織。它是英荷等國的貢獻。這個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圖，撇開宗教甚至政治。荷屬東印度公司認為政府該替它服務，它對政府卻無任何義務。它的董事會宣言裏居然包括有公然「賣國」的權利：「公司在東印度群島奪取的地方與據點是私商的財產，不得視為國家的征服，私商有權把它們賣給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

自南宋以來，華南已逐漸形成一個「海洋中國」的胚胎。但中國的海岸地區不甚寬大，無法和西方海權發源地的地中海比較，不能形成一個可與大陸帝國抗衡的力量。明代的華南沿海是大陸中國與從海上來的外人之間的折衝地帶，但他們處於夾縫地位，無法形成強大的自身認同。

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海上霸權時期，十八世紀則是英法兩家「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陸爭霸的時代。由一家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後，英國人就繼續東進搞「中國貿易」，挑起鴉片戰爭，從此中國不能維持鎖國，被強迫納入西式「全球化」。

牙國王或聯合省（即祖國荷蘭）的另一個敵國。」^②

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海上霸權時期。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初攻佔了葡屬東印度群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蘭人驅逐，只好專心發展印度。荷蘭人則往亞太區發展，在德川幕府「鎖國」以後，成為唯一在日本長崎還保留據點的歐洲人。他們搞「中國貿易」也想弄一塊像澳門那樣的落腳地，遂強佔舟山群島，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們去台灣落腳，根本沒把台灣當做中國領土。1641年，荷蘭人把麻六甲從葡萄牙人手裏奪了過來。

十八世紀則是英法兩家「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陸爭霸的時代。先是法國人發明用土著組成公司軍隊的方法，英國人效尤，並於1763年將法國擊敗。由一家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後，英國人就繼續東進搞「中國貿易」，在貿易逆差無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種植鴉片販賣給中國人，挑起鴉片戰爭，從此中國不能維持鎖國，被強迫納入西式「全球化」。

八 海洋時代的大陸帝國

西方海權的興起，最初並不代表陸權的衰落。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土耳其帝國仍進軍東南歐，至1529年圍困歐洲心臟地帶的維也納。1526年，瘸子帖穆兒的後代侵入印度，仍自稱是「蒙古人」，建立輝煌的莫臥兒帝國。

在西洋海權時代，歐亞大陸的心臟被中俄這兩個定居的「火藥帝國」

東西夾攻，草原帝國被消滅殆盡。1581年，俄羅斯已派哥薩克人進入西伯利亞，至1639年抵達太平洋岸。滿清未入關以前已經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國以後，向內亞洲進軍，於十八世紀中期消滅盤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勢力，並重新控制了西藏。

無疑，在西方稱霸海洋時代，掌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帝國仍有對抗的餘地，甚至像俄國般造成分庭抗禮的氣勢，但開風氣之先者仍是西洋的海權國家。大陸帝國背負傳統的包袱——無論農耕帝國還是草原帝國的——比較沉重。

自南宋以來，華南已逐漸形成一個「海洋中國」的胚胎。但中國的海岸地區不寬大，無法和西方海權發源地的地中海比較，不能形成一個可與大陸帝國抗衡的力量。明代的華南沿海是大陸中國與從海上來的外人之間的折衝地帶，華南的海上豪強雖然在不得已時充當一下「倭寇」，但他們通常扮演的角色是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人。處於這個夾縫地位，他們無法形成強大的自身認同^③。

但自南宋以來，華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後基地。這類對抗一般是北勝南，而後者的反抗餘波總會蕩漾於海外——不論是宋元之際、元明之際、建文帝與明成祖政權之移交，以及明清之際。從清初開始，台灣成為抗拒大陸政權的一個中心。這不是「海洋中國」的全體命運，還有海外華僑的故事。華人對亞太地區和南洋的殖民早於西洋人。但因為國家非但不支援，還視為「天朝棄民」，因此海外華人的生存採取「寄人籬下」方式，變成後來世界各地所有華僑的一個模式。

九 中國歷史的「長時期」結構

在西元第一個千年，中國以原有體制同化了華北的野蠻民族，另一方面地盤卻從北溫帶擴充到亞熱帶。隋唐以後南北兩區得賴大運河這條大動脈整合。進入西元第二個千年，這個模式重複出現：宋明兩個中土皇朝都先後亡於「外族」的蒙古與滿州，後兩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

宋上承唐代華南地區興起的趨勢，使經濟重心移到江南，並順理成章地走向海洋。因此，如果西元第一個千年中國從北溫帶延伸到亞熱帶，第二個千年則出現從亞熱帶走向熱帶的衝動。從宋到元，甚至包括國家壟斷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華南——都設有一連串的海口在吐納着遠洋貿易。這一帶可以說已經變成大陸帝國的「經濟特區」。

因此，第二個千年造成的大趨勢是：中國的發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東。今日中國得調整南北的先進和落後關係，更大的難題是如何發展整個大西部。第一個千年末，中國的首都已經越來越往東移——從長安到洛陽到開封。從宋朝開始，首都——開封、臨安、燕京——都得靠在大運河這條南北大動脈的邊上，落後的北方越來越依靠富庶的華南支援。但政治中心非但必須在北方，而且還得處於北方國防線上，除非這個朝代不是大一統政權。從755年的安史之亂到民國，亡國之肇機也有從西北方和正北方往東北轉移之勢。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設在農耕和草原交界的東北國防線上——金、元、明、清都奠都於燕京。

內亞洲既然是帝國第一防線，走向海洋的華南則勢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糧北調」的方式支援北邊的國防。而這種協調也成為整合面對內亞洲的華北和面向海洋的華南的可行方式。但是，這個雙面神 (Janus-faced) 式的帝國歸根結柢仍然是大陸性質的，它對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國」會感受威脅，並用閉關政策對付。

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還很多。中國在這個千年內不面向海洋的後遺症是造成今日人類23%局促在7%的可耕地的現象，是世界史的一個反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洋時代已經結束。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太空和電子資訊時代，用甚麼態度應付它，足以構成一個新挑戰。在這個轉型期間，溫習一下這一千年是怎樣走過來的，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性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難題，是十分應時也是十分有益的。

在二千年前期，中國不面向海洋的後遺症是造成今日人類23%局促在7%的可耕地的現象，是世界史的一個反常。如今我們面臨一個轉型期，溫習一下這一千年是怎樣走過來的，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性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難題，是十分應時也是十分有益的。

註釋

①⑩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chap. 2; 61.

②④ 魯亦冬：《中國宋遼夏金經濟史》，史仲文、胡曉林主編：《百卷本中國全史》，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5、21-24、30-35；51-52。

③ Charles O. Hucker,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6.

⑤ 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6 (1966): 33.

⑥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1), 34-35, 67-68.

⑦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2.

⑧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84.

⑨ Daniel Pipes, *Slave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6-47.

⑩ Joseph Needham, *Gunpowder as the Fourth Power,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5-19.

⑪ Joel Achenbach, “The Era of His Ways: In Which We Choose The Most Important Man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 *Washington Post*, 31 December 1995.

⑫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0, 259-60.

⑬ William H. McNeill, *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9), 7-18.

⑭ Jung-bang Lo,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ng Period”,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no. 4 (August 1955): 489-503.

⑮ Edward L.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New York: E. J. Brill, 1995), chap. 1.

⑯ 郭志猛：《中國宋遼金夏科技史》，史仲文、胡曉林主編：《百卷本

中國全史》，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48。

⑰ Jung-bang Lo,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vol. 5 (1958): 153-54.

⑱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33*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174.

⑲ Ray Huang, *China: A Macro-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172-73.

⑳ Edward L.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㉑ So Kwan-wai,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n.p.: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㉒ 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101; 130-31.

㉓ John E. Wills, Jr.,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in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d.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1-38.

孫隆基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拔塔大學，現任教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備受學術界及社會注意。